

新中国成立前的清华学生艺术团民乐队

○刘沫（1997级水利）

清华大学民乐队始建于1924年，隶属于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是一支声部建制齐全，融演出、演奏和教学为一体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

国乐团的成立

西乐东渐，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很长时间内，民乐在清华被很多同学甚至是校方，认为是落后甚至不太入流的艺术。在这种环境下，清华校内的同学和老师们只能互相扶持着成立民乐相关组织，举办活动。不但是学生与教工互相扶持，民乐与昆曲在当时也密不可分。

清华最早出现的民乐和戏曲社团是1919年成立的国声社，有昆曲和丝竹两部，存在时间不长。因为早期的清华学校里，学生主要是南方人，因此校内的流行乐种是江南丝竹，流行的戏曲种类是昆曲而不是京剧。1922年就成立了昆曲社团——菊社，菊社的成员除了排演昆曲，还表演丝竹乐。1924年5月泰戈尔来访清

华的时候，观看了菊社表演的国乐和昆曲，对国乐大加赞赏，请求再演一曲。第一个菊社停办以后，1926年又成立了第二个“菊社”，该菊社是一个京剧社团，这是后话。

1922年，清华校内还成立了一个教工的民乐组织“华员工会国乐团”，团员有图书馆管理员、报刊编辑、体育老师等，是一个以职员为主的教工社团。

资料表明，华员工会国乐团既演出江南丝竹，也演出昆曲。1923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在清华举办，接待演出中有民乐合奏和昆曲、京剧表演。参演者中，除了清华的教职员工，还有几位在校就读的学生。而这几位同学中，有人在1924年参与创办了学生社团“国乐团”。

学生国乐团成立后，在多方申请下，校方仍不支持，只说先请同学自己办着看看。学生自己凑钱解决了乐器的问题后，国乐团还是没钱聘请专门的国乐教师来



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民乐队演出合影（2023年5月21日）



泰戈尔（2排右）在清华（1924年5月）

校指导学习乐器和排练，而且没有排练场地。但是此时，学生国乐团得到了华员工会国乐团的帮助，教工们业余帮助指导同学们练习，并将自己的活动场地提供给同学们。

清华的民乐是体育老师教的

涂文先生这位清华的体育老师，为了清华大学的民乐可谓是操碎了心。涂文先生出生于1896年，原名涂传宪，别号奇峦，湖南省浏阳县人，我国著名体育教育家。涂文先生1927年8月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体育部任体育教员，1933年8月考取公费留学，在美国爱荷华州大学专攻体操和韵律体操，1936年学成回国后继续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体育，曾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代主任。1939年后，曾就职于云南大学、国立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前身）、湖南大学、山西大学，1956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委员。1975年病故，享年79岁。

涂文先生擅吹笙，一直热心辅导国乐团。留学美国期间也带着他的笙。1936年清华大学二十五周年庆祝会的国乐音乐会

便是由涂文先生负责筹备的，请了许多北京的民乐演奏家来校演奏。

不仅如此，涂先生在体育课上也不忘勉励同学们学习民乐。在他的体育课上，在同学们刚刚结束长跑还在气喘吁吁时候，他让同学们稍息，对同学们这样说：“前几年在清华，年年都有国乐社，这种组织是很好的。不过近年来大家都愿参加西乐会，对国粹反不理睬，国乐社也取消了，这不对的！须知在外国，中国音乐很受人欢迎。外国人士见我们能以简单的一丝一竹，奏出幽雅的歌谱，都觉奇异，极口称赞我们的。想当年我在美国，曾在一镇市之礼拜堂中吹笙奏曲。那时老少咸集，堂中几乎满座，一曲甫终，Encore之声辙起，奏毕步出，尤被大众包围，上至白发老嫗，下至红颜小友，争相与我握手，直握至二小时尤未已！”

除了涂文先生，清华的其他先生，如余文江先生、邹峰隽先生（教授笙、笛、琵琶）、余岱东先生（笙）、方家谦先生（二胡）、徐国祥先生、余光宗先生、薛天汉先生（昆曲）等，也指导过同学们学习乐器、昆曲、京剧，有时同台演出。

1924年成立的这个学生国乐团在1933年还在活动，但在1936年时已经不再活动。

清华大学成立中乐部

1929年，清华大学终于肯出资扶持中国传统艺术了，于是成立中乐部，聘请“红豆馆主”爱新觉罗·溥侗先生指导清华的“中乐”。这个行为，相当于是校方斥巨资把本已奄奄一息的清华民乐彻底打没气了。因为虽然早期清华民乐和戏曲纠



爱新觉罗·溥侗

纠缠缠，但戏曲和民乐毕竟还是两种艺术形式，尤其是近代民乐。

罗家伦接任校长后，在清华大学成立了中乐部。在叶公超教授的介绍下，1930年2月至1933年，清华大学聘请爱新觉罗·溥侗先生为中国音乐美术导师。与溥侗先生一起在中乐部任教的还有叶仰曦、赵石安、元伯维等，此外还有兼职的俞平伯、余日萱等教授。

当时溥侗先生在清华开设“中国古典音乐与美术”课程，每周4小时教授昆曲，2小时教授中国绘画，月薪400元。1930年春季学期开设“昆曲班”后，1930年秋季学期又开设了“国乐班”。乐器均由学校提供，场地更不成问题。昆曲班演出时曾引起轰动，甚至清华校外的男女老幼竞相来大礼堂观看表演。1933年，清华大学“以经费拮据，停昆曲课”，至此前后共活动了四年，四年间清华大学的校长竟也换了三任。

校方聘请溥侗先生主持中乐部的这个决定终是给了本就踽踽独行、处于萌芽阶段的清华民乐致命一击，使其彻底沦为昆曲的附属，失去了独立的发展空间和参与变革的可能。而在溥侗走后，清华民乐从此寂寂无声，一直到15年后的1948年春，

才才有了萌芽。

薰风国乐社（中国音乐学会）

“薰风国乐社”是在1948年春，由几位爱好民族乐器的清华学生发起、在清华音乐室张肖虎主任和戴世佺先生的积极支持下组织起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的音乐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南迁时，乐器并未随之南迁，而是由张肖虎先生代为保管。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以后，很快在过去中乐部、西乐部的基础上组建音乐室，由张肖虎先生领导，负责学生的音乐教学和指导工作。全校有歌咏队、男生歌咏队、农院混声合唱队、交响乐队及军乐队、钢琴班、声乐班、理论作品班等组织，均每周活动一次。

1947年时，音乐室除有张肖虎先生、戴世佺女士两位导师，有音乐教师9人，其中钢琴班教师5人、声乐班教师1人、提琴班教师3人。1948年“薰风国乐社”成立以后，又聘入西南联大文学院毕业的清华校友王震寰先生，王震寰先生后来成为民乐队指导教师。

清华复校后，同学们对音乐的热情远远大于战前，经常出席音乐欣赏讲演者约二百人，参加音乐室所组织之音乐活动者计五百余人，几占全校同学四分之一。

“薰风国乐社”建立后，张肖虎先生建议不仅是探讨古典的演奏，而且要从学术上研究中国音乐，因此更名为“中国音乐学会”，每周活动一次。1948年秋举办了第一次在学校的公开演出，并参加了全校的迎接解放和入城庆祝活动，1949年又参加了“三八晚会”、校庆、“五四联合演出”等演出活动。1949年5月以后，清



张肖虎先生

华大学成立了以系为单位的党、团支部，支部内活动成为学生活动的主要形式，兼之社团活动与学习功课的矛盾日益突出，全校的文艺体育社团都进入了休眠期。

民乐在清华存在的土壤

除中乐部的国乐班为校方主办，解放前的几个民乐社团均为学生自发发起组织的。这一方面体现了清华学生的音乐素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族音乐在当时令大多数知识分子感觉落后、土气，但根植在人们骨血里的民族性格始终会召唤着人们去亲近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

1924年《清华周刊》上刊载的一位清华校友尚仲衣留美后的来信：“清华学生……务必学一种中国乐器（月琴、箫笛、三弦、琵琶），用中国乐谱——得到中国国乐之精神。Violin & Piano学学亦好，然总不如在中国时，把中国的乐器学好，再学洋乐器，就我个人眼光，中国乐器的静的精神，比洋乐好在万分。”

而且，“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观念在那时已经有了雏形，尤其是那些曾经留学国外的同学对这一点认识得更加清晰，例如涂文老师在国外演奏的那段经历。

1948年以前在清华校内的先后数个学生民乐社团，几乎都是同时包含戏曲和器乐演奏的，器乐演奏都还承担着戏曲伴奏的任务，这说明那时的清华校内还没有真正存在过现代意义上的“民乐”。

1935年以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的音乐教育和音乐改革的探索加速朝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向前进。民族器乐的变革也在此时最终走向集体性，要求整齐、统一，并且强烈、饱满、谐和。这种声音的政治隐喻是显而易见的，它也成为随后中国民族乐队建设努力追求的目标。1937年，中央广播电台成立国乐队，这是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借鉴了西式乐队原理组建的民族管弦乐队。有了国家的支持，民族器乐的现代化革命从民间的自发、业余社团的性质走向国家行为，其改革被大大加速了。

1948年成立的“中国音乐学会”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标志着清华大学内第一支现代意义的“民乐队”的诞生。张肖虎先生是掌握了时代脉搏的。

建国以前，民乐在清华发展的艰难，固然有校方支持不足、同学热心不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孱弱、时局动荡。“仓廩实而知礼节”，国将不国的时候，哪里有心情再潜心研究音乐？不仅是民乐，西乐在清华也几度凋敝，连平静的书桌尚且容纳不下，何谈艺术？而歌唱、戏剧这种对装备要求低、发动群众的效果更直接的艺术形式在当时异常兴盛，即使是在举校南迁的西南联大时期，也并未停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进入稳定发展期，中国民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清华大学也从1948年起聘请教师专门指导民乐队，终于迎来了清华民乐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